DOI：10.19506/j.cnki.cn10-1428/d.2026.02.010 网络首发时间：2026-04-30 14:57:43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0.1428.D.20260430.1020.020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研究

——来自丽江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案例证据

冯朝睿 黄小红*

摘要：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命题。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旅居养老的发展面临主客关系割裂、资源利用低效与产业模式粗放等挑战。研究以丽江市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为案例，运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动态演进逻辑。研究发现，普济村的场景化策略创新经历了从探索、调适到重构的阶梯式演进，揭示了在内外压力驱动下，乡村通过状态诊断与策略创新实现经济奠基、社会整合与治理协同的内在逻辑。基于此，研究构建了“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了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在乡村旅居养老领域的应用边界，为理解旅居养老策略创新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践路径，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共同富裕；场景化策略创新；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乡村旅居养老

一、引言

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并系统部署了“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的战略任务。2026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制定推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完善老年用品产品、养老金融、旅居养老等支持政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实质在于通过不断完善的共享机制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郑功成，2022），但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冯朝睿，2023）。作为贯通城乡、

*冯朝睿：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黄小红（通信作者）：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后，云南财经大学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地区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的水平测量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3BZZ091）的阶段性成果。

衔接供需的新兴业态，乡村旅居养老产业在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乡村资源价值、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城乡文化融合以及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等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乡村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为其发展旅居养老产业创造了新的空间与应用场景。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拥有 26 个世居民族，以及得天独厚的气候、生态、文化、区位等优势，这构成了发展旅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民族地区乡村旅居养老的本质是依托民族文化生态资源，满足老年人健康照护、文化融入与精神归属等多维需求，旨在打造既能带来持续经济收益，又能促进主客文化交流、增强乡村整体福祉的新业态。

然而，在旅居养老产业实践中，市场逻辑与地方约束的矛盾往往导致政策驱动下的发展陷入困境。一方面，外部标准化、规模化的市场逻辑与地方独特的资源、文化及治理结构难以融合，导致项目与本土语境脱节；另一方面，乡村内部在资源整合、制度保障与主体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能力薄弱的问题，致使利益分配失衡、发展难以持续。双重困境不仅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利益分配失衡，更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乡村如何通过有效的场景化策略创新，驱动乡村旅居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并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既有研究虽从宏观层面论证了旅居养老的必要性，但如何破解市场逻辑与地方约束的冲突，这一问题亟须深入微观场域寻找证据。为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研究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云南省丽江市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的转型实践作为案例，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动态演进过程与核心逻辑是什么？第二，不同阶段策略创新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何实现资源激活、关系重构与瓶颈化解的目标？第三，如何构建理论框架以阐释策略创新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研究旨在探索既能激活乡村经济，又能提升乡村福祉的边疆民族地区旅居养老产业场景化创新策略，为早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范式与实践参照。

二、文献综述

（一）乡村旅居养老的学术史回溯

既有研究对乡村旅居养老的关注多集中于政策安排、产业融合与区域比较等宏观层面。部分学者将其视为乡村旅游或康养产业的子领域，聚焦于多元主体协作机制（曾诗鸿等，2022）、财税支持工具（郭佩霞等，2018）及医养资源整合（刘亚娜，2018）等因素对旅居业态形成的影响。也有学者在全球旅居养老的宏观叙事背景中，比较中西方在福利责任配置（施巍巍、罗新录，2014）、市场化运作逻辑（林宝，2021）及推动方式（王增文，2015）等方面的差异，提炼中国语境下的旅居养老经验。此外，还有学者从财政与社会资本在养老运营中的收益结构（倪东生、张艳芳，2015）、老年人口规模的前瞻预测（程明梅、杨华磊，2024）以及农村家庭代际分离与养老困境（康姣姣、吴方卫，2025）等层面展开研究，为理解乡村旅居养老的宏观结构与现实挑战提供了坚实基础。更为关键的是，既有研究在剖析智慧养老新业态时，已敏锐指出其发展是社会变迁、技术进步

及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申琦等，2024）。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静态分析与现状描述的层面，未能充分回应乡村旅居养老在实际推进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尤其缺乏对村集体、村民、旅居者等微观主体在具体场景中如何通过策略性创新破解困境、实现转型的深入探讨。旅居养老产业处于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框架之中，但对如何在激活乡村经济、提升主客双方福祉、实现城乡资源的有效互动以及促进发展成果公平普惠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怀与机理剖析。

（二）场景理论溯源与场景化策略创新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对“场景”概念的研究，构成了理解当前创新与共富的重要视角：其一，“场景”通常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目的等元素，场景价值强调因货、因人、因场的价值观，并遵循“价值—行为—结果”的主导逻辑（江积海，2019）。场景理论（scenes theory）以空间的符号意义和价值取向为研究重心，揭示空间中人群对文化价值的深层次需求（陈波、延书宁，2022）。其二，数智时代的研究焦点转向场景驱动的创新理论（context-driven innovation），强调通过对特定时空下复杂情境问题的深度洞察，实现战略、技术、组织、市场需求的动态匹配，核心在于以场景为中介，引导要素优化配置与价值共创（尹西明等，2022）。其三，作为前述脉络的实践深化，场景化（contextualization）超越传统的成果转化范式，强调场景化技术创新、场景化解决方案供给以及场景化价值释放（尹西明等，2024a）。

聚焦于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旅居养老，本文的核心概念——场景化策略创新——特指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行动主体基于对旅居养老群体复杂情境需求的深度洞察，通过资源编排与行动，对相关物理空间、社会关系与文化符号进行有目的的解构、改良与重构（王福，2023），最终实现从满足基础功能场景，到培育情感连接场景，再到整合多元服务场景的阶梯式演进过程（潘桐，2025；孙新波等，2024）。该概念的范畴界定在技术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迁移中，通过场景驱动实现服务供给最优化，在保障普惠性需求的同时满足特定群体的个性化诉求。

为具体阐释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实践形态，本文以普济村探索的“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模式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该模式旨在通过场景调适与重构，将闲置的农宅院落从单一的居住功能转变为集“医、养、旅、文、体”等于一体的复合场景：在收益层面，村集体将闲置农宅统一流转、改造后，以“保底租金＋经营分红”的形式反哺房主，并优先聘用本地村民参与运营；在空间层面，改造后的院落明确划分出康养空间与家庭空间，并规划共享的庭院、厨房和活动区域；在文化层面，定期组织纳西东巴文化体验、节庆共餐等活动，鼓励旅居养老群体参与乡村事务。该模式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产权、空间与社会交往安排，将外来旅居养老需求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

（三）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研究进展与理论缺口

现有成果初步揭示了场景、场景化在促进养老与文旅融合、培育新业态方面的潜在价值。在政策创新方面，现有研究强调通过区域养老服务政策协同促进服务均等化（封铁英、胡毓群，

2024）。在整合资源方面，现有研究强调通过单场景、多场景、跨场景的演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揭示场景迁移规律（尹西明等，2024b）。在文化体验方面，现有研究则尝试通过符号化叙事强化文化认同（冶进海，2025），并揭示康养旅居中节奏嵌入场景如何推动情感转化（韵江等，2024）。

尽管上述研究为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实践提供了学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理论局限。其一，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缺乏动态过程视角。现有研究多将“场景”视为静态的背景或容器，未能将“场景化策略创新”明确界定并操作化为一个回应压力、持续演进的动态过程，因而难以揭示策略的演进逻辑与机制。其二，理论框架整合性不足。相关讨论往往分散于空间、技术或文化等单一维度，缺乏能够整合多要素的系统性框架，这与场景化强调的系统性重构本质相悖。其三，价值目标模糊。既有研究对乡村旅居养老的价值取向多止步于经济效益提升或服务体验优化，尚未将共同富裕视域下发展与共享的目标纳入考量。创新过程如何同步构建公平的利益共享机制、培育主客一体的认同，并形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格局，缺乏机制性解释。研究指出，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实践具有异常丰富的实践场景、行动内容以及需要全面应对各种新挑战的时代特征，这要求研究者必须精准响应现实中的民生需求（冯朝睿，2025）。因此，针对乡村旅居养老这一特定场景，如何通过场景化策略创新来实现治理协同，不仅是社会保障学术共同体关注的核心命题，也是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必然要求。基于此，研究将场景化策略创新作为核心概念，选取普济村作为案例，深度追踪其动态演进过程，精准呈现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实践全貌，并总结提炼其过程机制、整合框架与驱动机理，为相同情境下的乡村发展旅居养老产业提供经验借鉴。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中的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旨在呈现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复杂动态过程与内在机制，属于典型的“如何（How）”类探索性命题，同时涉及“为何（Why）”的因果解释。纵向案例研究能够通过长时间段的过程追踪，观察研究对象在特定情境下的演化逻辑，从而捕捉到从压力触发到策略创新的完整因果链条。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的转型历时 11 年，具有完整演进周期，为观察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动态迭代提供了理想场域。

研究以普济村作为单案例分析单元，采取理论抽样策略，重点追踪典型事件节点，旨在深度解构其从旅游过境地向旅居养老栖居所跨越式转型（2014 ~ 2025 年）的演进机理。案例选取依据如下：（1）特殊性。普济村作为云南省“绿美村庄”“一村一品”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以及省级“旅居云南”试点村，集中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回应之间的关系，为观察宏观政策在微观场域的转化提供了独特场景；（2）典型性。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模式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与地域特色，是自下而上地平衡效率与公平、外来需求与内生发展的主动实践，其核心是探索可持续且包容性的乡村发展路径，成效显著；（3）数据的可获取性。团队深入开展跟踪调研，积累了丰富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为挖掘策略创新本质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案例介绍

普济村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束河街道中济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落，全村常住人口约 69 户、290 人，包括纳西、汉、白、藏、普米、傈僳等民族。2014 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其乡村旅游在 2018 年区域环境整治政策实施后陷入停滞，直至 2020 年新一届村领导班子确立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村委会通过拆除违建、升级基础设施、修复生态环境等举措，系统性地改善了村庄人居环境，为旅居养老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突破同质化竞争，普济村创新探索了“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村民在保留核心起居区的同时进行适老民宿改造，开发了纳西三叠水宴、傈僳族特色家宴等特色餐饮，并开放村民房前屋后的特色小菜园，开设民族一家亲茶席、纳西迎客曲、白族迎客茶等主客交流活动，从而形成养老社群。随后成立了普济乡村旅游公司，使旅居养老业态进一步拓展至花卉基地园艺治疗、马帮主题会客厅、农耕文化研学等项目，以丰富康养旅居体验，并增进旅居养老群体与当地居民的深度融入。

“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模式综合效益显著。在对内促进共富方面，旅居养老产业已成为村集体经济与村民增收的核心引擎。村集体通过公司化运营，于 2023 年全年累计接待旅居游客约 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 1000 万元，其中旅居消费占比达 45%。产业发展直接带动本村就业约 300 人，并间接带动周边就业超过 1500 人。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020 年的 2 万元大幅提升到 2023 年的 3.6 万元，其中旅居产业贡献率超过 60%，成为增收的主渠道。在对外满足旅居养老需求方面，普济村已成功吸引并服务了大量长居型旅居者。2024 年仅 1 ~ 8 月，旅居游客近 2.5 万人次，消费约 400 万元，已接近 2023 年全年水平，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冬季候鸟式养老群体平均停留时长为 82 天。以“同心客栈”为代表的民宿在旺季一房难求，淡季入住率也保持在 80% 左右，尤其是按月长租模式备受青睐。目前，来该村旅居的客群主要为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退休人群，丰富的村庄民俗活动促进了旅居者的社区融入。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当地独特的民俗，感受到村民的热情，享受到美好的老年生活。由此，普济村已从发展停滞的传统村落转型为当地旅居养老业态的新秀。

（三）数据采集

为确保案例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研究基于三角验证原则，从多个渠道收集数据。具体包括：（1）一手数据。自 2022 年 9 月起，团队先后 7 次深入普济村开展田野调查，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以获取系统性信息，并辅以实地非正式访谈，以获取经济效益、村民建议、旅居养老体验等资料。访谈对象共计 55 人（详见表 1），研究团队通过在村民家中、村活动中心、客栈等场景开展访谈，收集一手资料。同时，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类编码；（2）二手资料。除访谈外，团队整理了普济村相关政策文件，并搜集行政文书、会议纪要、地方志与非遗档案、媒体公开报道等二手资料共计 34 份，以进行数据补充和佐证（见表 2）。所有数据均采用“资料类型 + 来源时间 + 人员编号”编码体系进行结构化处理。

表 1 一手数据信息及编码

数据来源	类型	编码	访谈内容	访谈时长（小时）	有效转录字数（万字）
半结构化访谈	地方政府官员	G_{01}–G_{08}	政策执行弹性、跨部门协作机制、资源分配逻辑	15.5	约 3.21
	村集体成员	P_{01}–P_{12}	土地权属争议、集体决策参与、传统规则延续性	21	约 4.83
	旅居养老企业代表	K_{01}–K_{05}	投资回报压力、服务创新瓶颈、政企协商框架	9	约 2.25
	旅居养老群体	E_{01}–E_{10}	服务供需错位、社区融入障碍、文化认同需求	12	约 4.38
	非遗传承人	W_{01}–W_{10}	文化符号资本化、代际传承困境、主客互动张力	14.5	约 4.05
非正式访谈	非正式追踪访谈	F_{01}–F_{10}	政策执行动态、冲突事件演变、自组织创新验证	27	约 4.13

注：1. 编码规则：大写字母代表访谈对象类别（G- 地方政府官员，P- 村集体成员，K- 旅居养老企业代表，E- 旅居养老群体，W- 非遗传承人，F- 非正式追踪访谈），数字为访谈顺序编号；2. 访谈对象中，地方政府官员包括市级、区级的民政与文旅部门领导 3 人、乡镇干部 3 人、基层执行人员 2 人；村集体成员包括现任村两委班子成员 5 人、前任村干部 2 人、普通村民 5 人；旅居养老企业代表包括村办旅游公司负责人 1 人、外来投资企业管理者 2 人、本地民宿经营者 2 人；旅居养老群体包括长居型 6 人和季节型 4 人；非遗传承人包括东巴文化传承者 3 人、传统手工艺人 4 人、民俗活动组织者 3 人；以及非正式追踪访谈对象 10 人；3. 表中“有效转录字数”为一手数据中各类资料编码后实际用于分析的总字数，下表同。

表 2 二手资料信息及编码

数据来源	类型	名称	有效编码字数（万字）	编码
纵向政策文本（L_i）	省级政策	《云南省绿美乡村三年行动方案（2022 ~ 2024 年）》等	2.51	L_1
	市级政策	《丽江市古城区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等	1.65	L_2
	区级政策	《古城区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	1.27	L_3
横向过程档案（H_i）	基层行政文书	纠纷调解书、村规民约修订草案等	2.12	H_1
	内部会议纪要	村企合作协商记录、集体经济收入审计报告、分红明细等	2.82	H_2
	地方志与非遗档案	纳西民居测绘图纸、古树名录等	1.35	H_3
	媒体公开报道	新华网、云南日报、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网站	2.58	H_4

注：编码规则：大写字母代表数据来源类别（L- 纵向政策文本，H- 横向过程档案），数字为同一类别内的文件大类编号，其中：省级政策 3 份、市级政策 5 份、区级政策 5 份，基层行政文书 6 份，内部会议纪要 4 份，地方志与非遗档案 3 份，媒体公开报道 8 份，共计 34 份。

（四）数据分析

研究采用一阶 / 二阶的编码路径，在 NVivo 14 软件中完成从原始资料到理论框架的推导，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一阶概念提取，对与旅居养老场景相关的现象、行动与感受进行初始分析，形成经验性的一阶代码。例如，针对“旅游旺季一房难求，淡季却大半院子空着”的观察，提炼为“资源季节性闲置”；第二阶段进行主题归纳，对一阶代码进行归类、合并，最终凝练出 15 个二阶主题，以揭示驱动或制约乡村旅居养老产业发展的关键维度。例如，将“品牌辨识度不足”“客

源争夺白热化”“技术迭代瓶颈”抽象为“竞争性压力”；第三阶段进行聚合构念提炼，深入分析二阶主题的动态关系，并紧密结合案例的纵向时间线进行过程追踪，从而发现外部情境压力与内部发展约束共同塑造了乡村发展，且乡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触发差异化的场景化策略创新；策略的实施不仅有效回应了压力与约束，而且驱动系统状态向更高阶段演进，最终形成递进式的场景效应。这种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动态关系，构成了本文核心理论框架的逻辑主线，具体数据结构见图 1。为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研究中每个一阶概念的提出至少需要三个不同来源的数据支持。同时，在编码过程中不断将新发现与已有资料、既有理论进行比对，对关键节点的概念归纳和框架提炼邀请专家进行多轮修正。从而实现从原始资料到一阶概念、二阶主题、聚合构念的完整逻辑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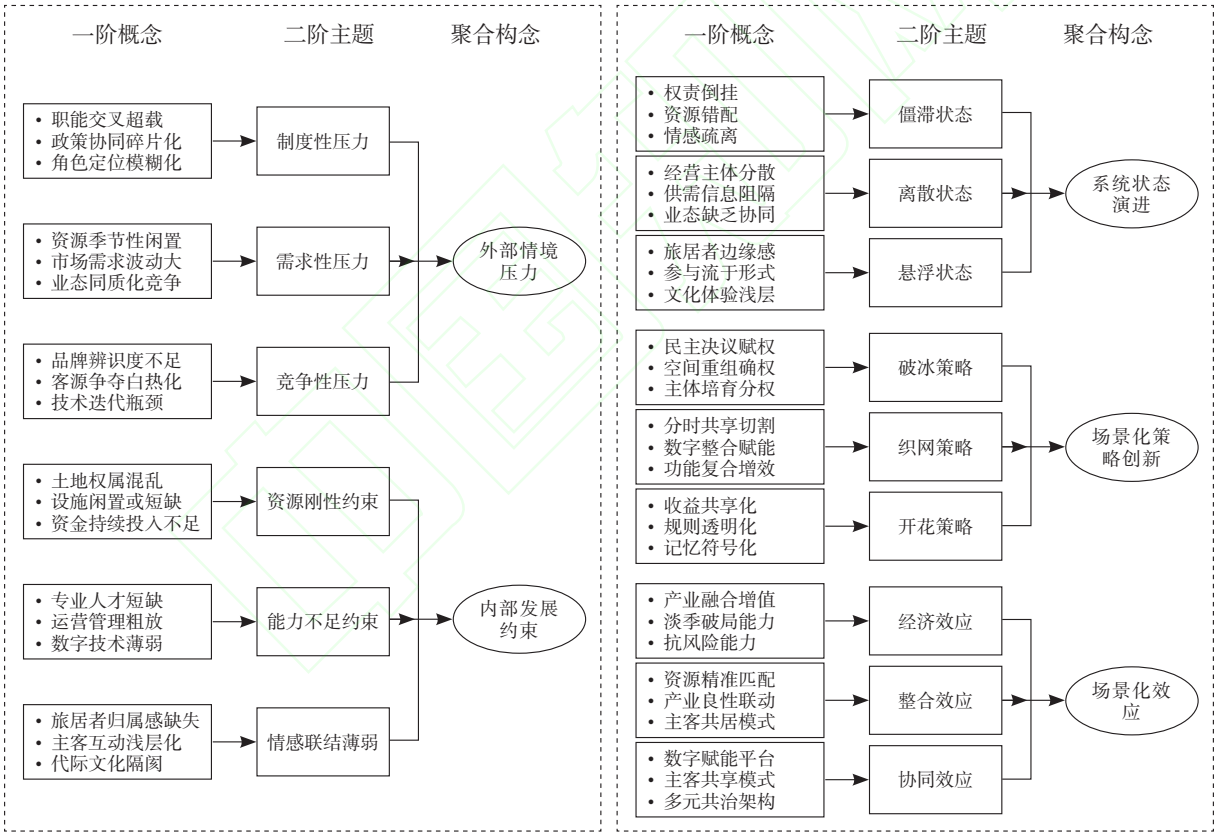

图 1 普济村旅居养老研究数据结构图

四、案例分析

普济村从传统农业村落到旅居养老产业的转型，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研究以关键事件为节点，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探索阶段（2014 ~ 2020 年）、调适阶段（2021 ~ 2023 年）和重构阶段（2024 ~ 2025 年），具体关键事件时间轴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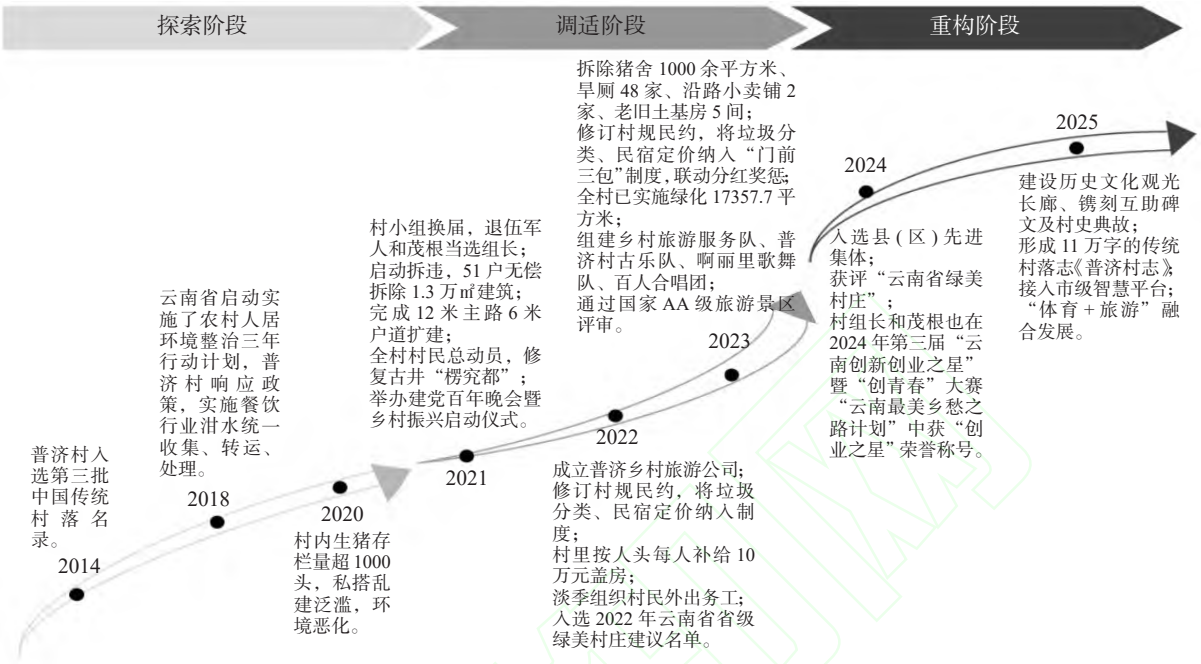

图 2 普济村旅居养老发展历程关键事件时间轴

（一）探索阶段

2014 年，普济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民族文化资源，但发展初期即面临制度性压力与资源刚性约束的困境。制度上，村级组织面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职能超载、政策碎片化与角色定位模糊化的窘境；资源上，土地权属混乱、设施闲置与短缺并存，资金持续投入不足。此双重压力使普济村陷入僵滞状态，具体表现为权责倒挂削弱行政动员力，资源错配扭曲产业走向，因长期看不到发展希望，村民之间以及村民对村集体产生了情感上的疏离，这种疏离进而引发了信任危机，村庄发展困境致使周边流传着“嫁人不嫁普济村”的说法。在此情境下，普济村开始了转型发展的探索之路（2014 ~ 2020 年）。

1. 场景化策略创新：僵滞状态下“破冰策略”的激励机制

为破解村庄发展僵滞的困境，普济村的“破冰策略”构建了多层次的激励机制，其核心在于通过民主协商重构治理规则，通过空间重组激活闲置资源，以及通过主体培育重建村庄认同。首先，通过民主决议实现“以权换利”。面对修路需拆迁的难题，村集体将决策权交给村民代表大会，“全村 69 户中有 51 户主动无偿拆除占道建筑，累计让出土地并拆除违规建筑达 1.3 万平方米”（基层行政文书，H1-202011-03）。其次，通过空间重组实现资源变现。村庄利用 3000 万元项目资金将废弃猪圈、闲置鱼塘改造为共享菜园、垂钓基地等公共空间，不仅改善了环境，而且直接创造了就业岗位。最后，通过主体培育激发内生动力。“引导持证民宿根据市场供需动态定价”（村集体成员，P-202006-06），重点培育首批具有自主经营能力的民宿业主，促使村民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经营，

奠定了利益基础。

2. 场景效应：经济成效初显

“破冰策略”的推行使乡村核心发展要素从闲置状态被激活，经济效应初显。首先，建立了发展的初始条件。面对环境整治及拆违建等外部政策要求，村集体通过民主协商将政策议题交给村民共同讨论，在反复沟通中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村规民约。其次，村集体对生产要素进行市场化配置与价值转化。在项目资金支持下，废弃圈舍等闲置空间被改造为可经营性公共空间。同时，村集体通过针对性培训，实现了本地劳动力向经营者的初步转型，“非遗扎染工坊带动主题餐饮发展，7 家民俗主题餐馆户均增收 3.2 万元”（村集体成员，P-202012-12）。村集体将本土资源通过初级加工与服务业态相结合，实现了村集体的商业价值转化，产业链亦得到延伸。最后，发挥集体经济的保障功能。“面对重大动物疫病冲击时，村集体动用应急资金，保障村民基本生活”（内部会议纪要，H2-202006-04），前期积累的集体资金在应对突发风险、维护社区稳定方面起到了托底作用。

探索阶段的本质是要素破局。通过“破冰策略”，制约发展的制度、资金、土地、人力等基本要素被有效动员，并在政策、人力、产业、文化等维度建立了初步的激励与协作关系。尽管创新形式较为初级，但成功打破僵局，为村集体后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调适阶段

在探索阶段奠定的基础上，普济村旅居养老产业发展进入调适阶段（2021 ~ 2023 年）。随着市场认知度的提升，村集体开始面临更深层次的矛盾：一方面，外部因资源季节性闲置、市场需求波动，以及周边业态同质化竞争加剧，形成了需求性压力，暴露出村集体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另一方面，内部专业人才短缺、运营管理粗放以及数字技术薄弱构成了能力不足约束，共同限制了服务品质提升。双重压力使普济村陷入离散状态，具体表现为经营主体分散、要素信息阻隔以及各业态之间缺乏协同。

1. 场景化策略创新：离散状态下“织网策略”的整合机制

为最大化释放潜能，普济村的“织网策略”聚焦于三个层面的整合机制，其核心是重组资源，将分散的供给能力编织成弹性服务网络。其一，分时共享着力破解资源季节性闲置困局，对时空资源进行精细化切分与弹性适配。“同心客栈淡季保留农户自住空间，旺季全部出租给商户经营”（旅居养老企业代表，K-202205-01），实现了单一空间在不同时段的效能最大化。其二，数字整合赋能精准服务，提升运营效率。村集体充分开展“协商在基层”“干部规划家乡”等工作，并依托数字化平台，整合了涵盖养老需求数据 127 条及企业服务资源 23 项关键信息（非正式追踪访谈，F-202208-02），实现了订单、服务的线上协同。至 2023 年底，全村接入在线平台的民宿从 3 家增至 11 家，线上订单占比超过 70%，运营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旅居养老的服务响应速度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其三，功能复合打造文化空间，创造主客共享的体验价值。村集体把石榴广场等公共空间打造为集休闲、民俗、展演于一体的复合场景，创造了持续的吸引力（媒体公开报道，H4-

202304-04）。2023 年常态化举办的各类节庆活动，吸引了超过 3 万人次的旅居游客参与，不仅丰富了旅居者体验，也为村民经营餐饮、文创产品带来了直接客源。

2. 场景效应：整合效应深化

“织网策略”的推行实现了从要素激活到要素联结。在此阶段，主客互动、产业协同与运营管理通过场景化策略创新被有效整合。首先，数字技术的引入为整合提供了关键载体。村集体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旅居者需求与本地服务资源，使原本分散的需求得以汇聚。相关数据不仅用于提升订单匹配效率，更开始引导产品的精准供给，“通过传承人与科技团队共创的模式，培养数字化传承人 23 名，平均年龄下降至 39 岁，带动周边村民开发数字文创产品”（非遗传承人，W-202306-06），这表明技术深度嵌入本土知识体系，催生了传统资源与现代市场需求的创新性融合，为产业升级注入了新动能。其次，文化传承与产业升级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线上订单增长倒逼民宿、餐饮等业态提升服务水平，而这些服务本身即是文化传播的载体。2023 年，普济村旅居收入约 450 万元，带动本村就业约 300 人，许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转型，成为民宿管家、餐饮服务员或文化导览员等新职业。最后，整合进程从节庆活动化走向日常生活。村集体常态化举办三朵节、火把节、阔时节等民俗活动，持续吸引旅居养老群体参与传统仪式。这个阶段形成了“主客共居”模式，“部分村民在自家房屋中选择几间居住，其余空闲房屋用于民宿经营，初步接待短期旅居者，提供基本住宿和餐饮服务，旅居者与村民在同一屋檐下互动”（旅居养老群体，E-202310-10），实现了空间、关系与认同的深层融合。

调适阶段的本质是整合网络的搭建。通过“织网策略”，数据、产业、人力、文化等关键要素被有效联结，其整合效应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提升，更在于社会关系的深化，标志着乡村数字化与网络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质性提升。这既是对老年人在物理环境、社会支持和精神文化方面（戈艳霞、王宇璇，2024）实际需求的积极回应，更是对以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多维协同推进机制的生动实践与探索（冯朝睿、徐宏宇，2023）。

（三）重构阶段

2024 至 2025 年，普济村旅居养老产业迈入深度重构阶段。随着产业生态的持续深化，系统内部暴露出新的困境。对外，周边村落的效仿使客源争夺陷入白热化，加之品牌辨识度不足与技术迭代瓶颈的挤压，共同形成了严峻的竞争性压力。对内，随着旅居养老群体停留时间的延长，原有的临时性交互已难以满足其深度参与需求，主客互动浅层化、代际文化隔阂等隐性矛盾逐渐显现，暴露出情感联结的深层次瓶颈。双重压力使普济村陷入悬浮状态，具体表现为旅居养老群体在社区参与上的边缘感，尤其是文化体验仍停留在形式参与层面，未能真正转化为深度情感认同。

1. 场景化策略创新：悬浮状态下“开花策略”的协同机制

为深化共创福祉，普济村系统实施了“开花策略”，通过构建透明化、共享化、符号化三维协同机制，其核心是将上一阶段建立的浅层连接深化为基于深度信任、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的共生关

系。首先，收益透明化是构建经济信任的根基。“普济村的乡村旅游公司，累计公示收益数据 47 次，村民可通过手机应用查看收益明细”（地方政府官员，G-202401-01），此外，收益共享化将经济收益从抽象数字转化为可感知、可监督的具体成果，奠定了信任基础。其次，规则透明化实现了制度规范向文化伦理的升华。普济村将纳西等少数民族村规民约所蕴含的价值共识融入社区治理中，促使外部规则内化为村民和旅居者的精神认同。最后，记忆符号化是强化情感认同的关键手段。“建设历史文化观光长廊、镌刻互助碑文及村史典故，保护和展示优秀文化资源和记忆”（非遗传承人，W-202508-08）。上述三者协同运作，使得经济、文化与情感在多维嵌套中竞相“开花”，为普济村的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可持续保障。

2. 场景效应：协同效应生成

“开花策略”催生了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系统从基础连接迈向全面融合，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共生关系。首先，关键流程实现了机制性融合。收益的在线透明公示，实现了分配信息的公开、数字技术的赋能与信任构建的协同，有效解决了共享经济中的代理与监督成本问题。“接入智慧旅游平台，整合民宿预订、活动安排与游客反馈，实时数据助力精准营销”（旅居养老企业代表，K-202501-01），则是服务供给、运营管理与数字中台的融合，使价值创造、传递与分配的过程更高效、可信。其次，规则体系与多元主体完成了结构性整合。村规民约实现了外部政策规范、社区自治传统与内部价值共识的统一。“普济村成立‘村组＋企业＋第三方＋合作社＋农户’五位一体治理架构，明确各方职责”（地方政府官员，G-202502-05），更是在组织层面将多元主体整合为一个权责清晰、利益关联、行动协调的共治网络。最终，社区认同经历了结构性转化。“村民将房屋改造成民宿、餐厅和咖啡馆等，与客人共住同一屋檐下，共享厨房、庭院和菜园等设施，时常邀请住客围炉煮茶，一起参与节庆、集会、打跳、议事等”（旅居养老群体，E-202502-02），旅居者的角色从短期消费者逐渐转向长期社区参与者，本地村民则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文化的持有者与发展成果的共享者，真正实现从“主客共居”到“主客共享”的转型，为旅居养老产业的可持续运转提供了根本保障。

重构阶段的本质是系统融合。通过“开花策略”，前期形成的制度性与功能性壁垒被实质性打破。政策、资金、产业、人才、数据、创新等要素，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深度互嵌为一个能够自我强化、价值循环的治理生态系统，最终完成从物理空间共享到社会价值共创的范式跃迁。

五、理论构建：一个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普济村通过场景化策略创新破解了乡村旅居养老的外部情境压力与内部发展约束，历经探索、调适与重构三个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少数民族农业村”向乡村旅居养老产业范式的成功转型。基于此，文章构建了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理论分析框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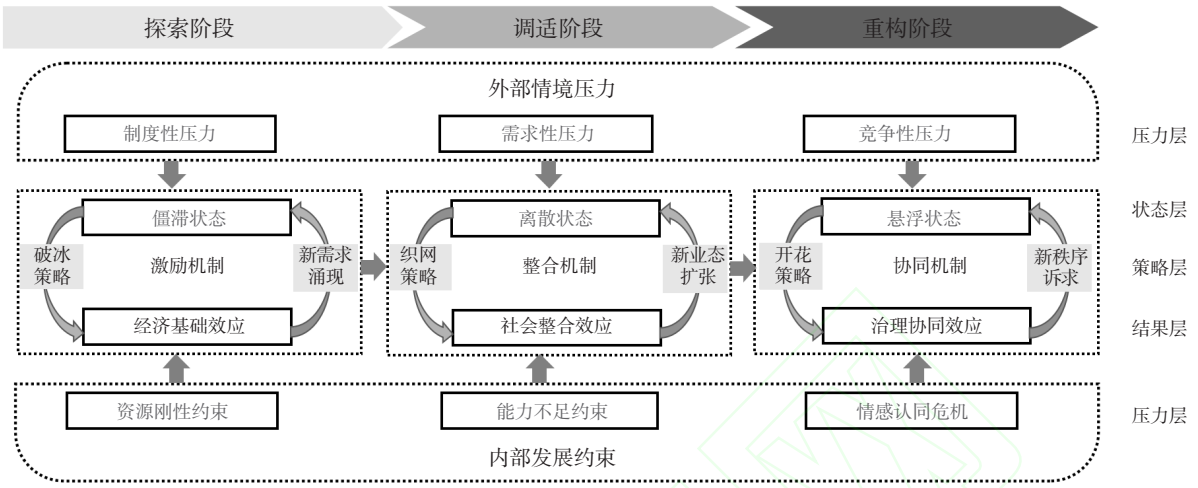

图 3 “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1. 该框架的机制演化规律阐释

该框架所揭示的核心机制演化规律，不仅呈现了“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的动态适应过程，而且是对场景理论“价值—行为—结果”主导逻辑（江积海，2019）在乡村共同富裕实践场域中的动态化与机制化阐释。该框架将静态的场景解构为由压力驱动、状态演进与策略创新构成的连续过程。

首先，系统演进的根本动力是双源压力的持续作用与转化。外部情境压力与内部发展约束并非静态存在，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动态变化。探索阶段以制度性压力和资源刚性约束为主导，迫使系统“破冰”激活；调适阶段，需求性压力和能力不足约束上升为主要矛盾，驱动系统“织网”链接；重构阶段则面临竞争性压力和情感认同危机的叠加，催生系统“开花”融合。压力的持续演化，不断为系统设定新的、必须回应的发展议题。研究的动态分析超越了将场景视为既定时空背景的静态视角，精准地满足了场景驱动创新理论强调的“特定时空下复杂情境问题的深度洞察”的要求（尹西明等，2022），并具体阐明了何种情境会驱动策略创新。

其次，系统状态的递进是压力与策略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但每个状态都并非完美状态。僵滞、离散与悬浮三种状态并非简单的好坏递进关系，而是每一阶段系统应对双源压力时所呈现出的、有待解决的新的核心矛盾形态。僵滞状态下要素无法启动；离散状态下要素启动后却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悬浮状态下建立了协同网络，但参与者在心理与情感上未能真正融入。悬浮状态表明，系统虽已在硬连接层面建立连接，但在软连接上尚未深度契合，因而系统未达到完美的共生形态。系统的每一次跃迁均以前一阶段的结构为基础，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也为应对更复杂的挑战积蓄新势能。研究对系统状态的精细刻画，一方面，弥补了场景理论在系统演进关注不足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将宏观的价值取向（陈波、延书宁，2022）具体落地为可观察、可干预的系统结构性问题。

最后，场景效应的呈现并非策略的终点，而是触发新一轮系统演进的关键反馈。本框架的重要

发现在于，策略创新产生的场景效应本身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探索阶段的经济效应吸引了大量旅居养老人群涌入，但服务供给难以跟上，由此催生了对专业化服务与数字化管理的新需求。调适阶段的整合效应实现了规模化协同，但也引发了同质化竞争，由此催生了新业态的扩张。重构阶段的协同效应在秩序建立之后，又会催生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共同富裕战略对接的新秩序诉求，推动村集体进入下一轮更高层级的演进。这种循环演进揭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成功的场景化并非一次性的解决方案供给（尹西明等，2024a），而是场景驱动价值释放、新价值诉求又重塑场景的循环过程。

2. 该框架的策略演进规律阐释

场景化策略创新从“破冰”“织网”到“开花”，高度依赖于对场景中数据结构的深刻理解与动态转变，共同推动乡村旅居养老场景从雏形走向成熟。

在策略的作用广度上，其呈现出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融合的演进。探索阶段的“破冰策略”旨在定向解决系统致命瓶颈，集中作用于政策共识形成与启动资金注入这两个核心节点，建立初步激励机制，撬动基础要素。调适阶段的“织网策略”旨在将不同维度资源系统地编织进产业发展与社区生活，从而打通产业、空间与社群关系的网络。重构阶段的“开花策略”则实现了从网络到生态的跃迁，旨在打破所有要素及主体间的功能性壁垒，推动政策、资金、产业、人才、数据、创新等要素与多元行动者深度互嵌（尹西明等，2024a）。

在策略的干预深度上，其呈现出从流程再造到秩序构建的转变。“破冰策略”深度依赖并整合外部项目资金与行政力量，对系统施加决定性影响，从而启动村集体发展。“织网策略”系统性地引入数字技术与管理标准，对业务、信息与服务响应进行结构化优化与效能提升，解决要素离散问题。“开花策略”则深入到社会治理的核心，引导社区利益共享与事务共治，其深度逐层深化。这表明，场景化价值释放不能止步于技术与效率层面，必须深入到治理与认同的社会价值层面。在策略与系统的关系上，其经历了从设计工具到组织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初期的策略由少数带头人主导，并从外部引入。随着“村集体公司”等中间组织的成熟，策略的制定与执行被吸纳并制度化为系统内部的组织功能。而系统成熟的最终标志，在于策略创新内化为系统的自适应与进化能力，从而确保其在动态环境中持续进化。

（二）该框架的理论创新

研究构建的“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分析框架，源于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实践的深度提炼。其理论创新是在深刻反思当前乡村旅居养老研究相关理论视角局限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次系统性整合与超越。该框架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动态框架，以回应乡村旅居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它不再孤立地看待资源、结构、行为或体验，而是创新性地将双源压力识别为驱动系统的根本动力，并将系统状态诊断为系统在特定阶段的结构性表征，突破了将场景视为静态背景的传统视角，将其重构为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复杂系统，揭示了乡村主体如何通过精准的场景化策略创新改变系统状态。更关键的是，它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人民性”本

质（郑功成，2023）。在普济村的实践中，“人民性”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通过经济成效让村民共享发展收益，通过整合效应让主客在共居中共建认同，以及通过协同效应让多元主体在透明规则下共治共享。

在方法论层面，该框架通过机制演化与策略演进分析，构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桥梁。一方面，框架明确了僵滞状态需“破冰”激励，离散状态需“织网”整合，悬浮状态需“开花”协同的规律，为乡村发展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对策略的作用广度、干预深度、与系统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场景化策略创新从要素破局到网络构建，再到生态共生的完整跃迁路径，以及从外部驱动到内生构建的动力转换机制。研究细化了场景化的实现过程，揭示了其最终目标是培育乡村的自适应与进化能力，在理论上回应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切。

最终，在实践解释层面，本框架为解码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微观场景中的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过程模型。研究表明，共同富裕在普济村的实践，是同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深度协同、阶梯式展开的动态进程。经济效应奠定了物质共享的基石，整合效应丰富了精神生活并促进了主客融合，协同效应则通过制度化方式为成果的可持续共享与社区的深度认同提供了保障。尤为关键的是，新需求、新业态及新秩序的涌现表明，共同富裕的实践是不断回应更高层次诉求的持续进程。研究为理解国家战略如何在基层实施与迭代提供了一个微观案例与具有普适性的分析框架。

六、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唯有坚持场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方能为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韧性的解决方案。研究通过对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的深度剖析，构建了“双源压力—系统状态—策略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系统揭示了乡村旅居养老场景化策略创新的动态演进逻辑，不仅在学理层面阐释了普济村“主客共享型院落经济”的内在机理，而且在实践层面展现了其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价值。普济村的实践，是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关于如何实现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生活理念有机融合的一种地方探索。通过主客共享模式，村集体在有效回应外部压力与内部约束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增收、社群融合与治理协同的良性互动，使老年群体、本地村民与旅居者在互动中共同成为发展成果的分享者和社区价值的创造者。这一创新既是对促进共同富裕国家战略的微观呼应，而且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具体诠释，更可视为民族地区立足自身文化传统与资源禀赋所开展的现代化旅居养老场景化创新的成功实践。该实践为民族地区现代旅居养老、社区重建、文化传承与制度创新开辟了新道路，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实现模式，也为开创人类制度文明新形态贡献了民族地区的独特经验。

参考文献：

陈波、延书宁，2022，《场景理论下非遗旅游地文化价值提升研究——基于浙江省 27 个非遗旅游小镇数据分析》，《同

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程明梅、杨华磊，2024，《中国城镇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及养老服务需求预测》，《北京社会科学》第 3 期。

封铁英、胡毓群，2024，《区域养老服务政策协同测度、演变及其均等化效应——以长三角为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冯朝睿，2023，《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理论谱系·现实逻辑·实施策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冯朝睿、徐宏宇，2023，《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实践效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冯朝睿，2025，《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学术研究共同体——基于〈社会保障评论〉496 篇文献的计量统计分析》，《社会保障评论》第 6 期。

戈艳霞、王宇璇，2024，《人 - 境匹配理论与社区居家养老体系的整体性优化》，《社会政策研究》第 3 期。

郭佩霞、胡彬，2018，《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探析》，《税务研究》第 1 期。

江积海，2019，《商业模式创新中“逢场作戏”能创造价值吗？——场景价值的理论渊源及创造机理》，《研究与发展管理》第 6 期。

康姣姣、吴方卫，2025，《家庭代际居住分离、自理能力与农村养老困境——基于 2013—2018 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第 3 期。

林宝，202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新进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 1 期。

刘亚娜，2018，《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政策网络与耦合协同》，《中国行政管理》第 8 期。

倪东生、张艳芳，2015，《养老服务供求失衡背景下中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政策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 11 期。

潘桐，2025，《乡村场景化：苏南“薄弱村”里的城乡融合》，《社会建设》第 4 期。

申琦、李立哲、蔡耀辉，2024，《从探索产业布局到完善服务体系：我国智慧养老政策的演化历程与问题探究》，《社会政策研究》第 3 期。

施巍巍、罗新录，2014，《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变与国家角色的定位——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理论探讨》第 2 期。

孙新波、苑丽秀、何建笃、刘剑桥，2024，《数字内容平台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场景化创新——基于资源行动视角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 8 期。

王福、刘欣悦、刘俊华、长青、韩丽萍，2023，《场景如何基于价值主导逻辑演变与企业动态能力进阶交互赋能商业模式创新——蒙草生态案例》，《科技进步与对策》第 23 期。

王增文，2015，《农村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社会认同度研究——基于宗族网络与农村养老服务政策的比较》，《中国行政管理》第 10 期。

冶进海，2025，《符号化、场景化、数字化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中的创新路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尹西明、钱雅婷、武沛琦、陈劲，2024a，《场景驱动科技成果转化：理论逻辑与过程机理》，《科学学研究》第 11 期。

尹西明、武沛琦、钱雅婷、李纪珍，2024b，《先立后破：场景驱动如何助力 AI 新创企业实现最优区分？——基于微言科技的纵向单案例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 12 期。

尹西明、苏雅欣、陈劲、陈泰伦，2022，《场景驱动的创新：内涵特征、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科技进步与对策》第 15 期。

韵江、郑密，2024，《旅居何以康养？——节奏分析视角下康养旅居对身心健康的“单向度 - 循环”影响研究》，《旅游学刊》第 3 期。

曾诗鸿、王成秀、钟震，2022，《中国城市养老服务体系的宏观政策与服务质量分析：文献综述》，《宏观质量研究》第 6 期。

郑功成，2022，《共同富裕与社会保障的逻辑关系及福利中国建设实践》，《社会保障评论》第 1 期。

郑功成，2023，《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障新制度文明》，《社会保障评论》第 1 期。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whose emergence results from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of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logic, policy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Locally adapted welfare theories provide conceptual support;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social assistance "expansion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establishes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constitute practical demands. As a deepened extension of the tiered and classified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covers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mprehensively and supports five dimensions: basic protection, risk prevention, service provision, capacity enhancement, and spiritual support. It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assistance's identity-bound and homogeneous supply limitations, forming a demand-oriented,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assistance pattern. To resolve practical obstacles in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four mechanism innovations are key: dynamic monitoring and risk warning,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resource support, and grassroots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support includes conceptual reshaping, tool integration,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 closed-loop optimization path of "dilemma–mechanism–system"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normalized precision assistance for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assistance aft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Scenario-Based Strategy Innovation for Rural Sojourn Elderly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Evidence from the "Host–Guest Shared Courtyard Economy" in Puji Village, Lijiang

Feng Zhaorui, Huang Xiaohong 143

Abstract: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are core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journ elderly care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fragmented host–guest relationships, inefficie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extensive industrial models. Taking the "host–guest shared courtyard economy" in Puji Village, Lijiang Cit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mploys a longitudinal single-case study method to reveal the dynamic evolutionary logic of scenario-based strategy innovation in rural sojourn elderly care. The study finds that scenario-based strategy innovation in Puji Village has undergone a stepwise evolution from exploration to adjustment to reconstruction, revealing the internal logic through which, driven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rural areas achieve economic found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via state diagnosis and strategy innovation.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ual-source pressure–system state–strategy innovation,"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boundary of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rural sojourn elderly care,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understanding strategy innovation in sojourn elderly care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ffer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order ethnic regions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Exploring Pathways for Ethnic Cultural Industries to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The Case of Yi Embroidery

Hou Ruoyi, Liu Aiyu 158

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quires exploring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hways. In response to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mpowerment practices—namely "individual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subsidized project support" models—in terms of collectivity, industrial vi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Yi embroidery in Chuxiong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Using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theory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attemp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defines a systematic practice paradigm—"the Chuxiong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Chuxiong Model" is state-led 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Through systematic social investment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solidate market foundations, enhancing the human capital of the "embroideress" group as the core driver, and building a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the model successfully transforms dispers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a large-scale specialty industry, ultimately achiev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inclus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is model not only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imilar regions but also deeply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a "strong state" as an initial driver in China's rural context and its evolutionary direction toward a "collaborato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theory, and revealing the variability of the state's role across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bility boundaries of the model.